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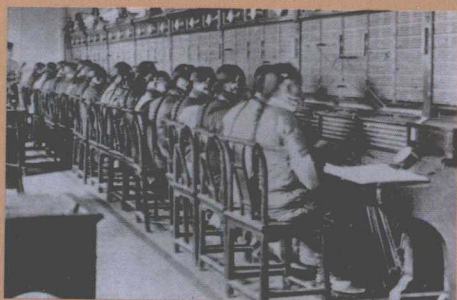
辛亥百年

上海市社联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学术丛书

他们在大清末年

Taimen zai Daqing Monian

顾孝华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他们在大清末年

顾孝华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胡适看到一本“用功极勤”的《李鸿章年谱》说：“这哪是‘年谱’，简直是‘日谱’！”唐德刚曾“有意效颦，撰‘胡适年（日）谱’”。本书亦“有意效颦”，选了几位不同年龄、身份、立场的历史人物，像编撰年（日）谱那样，记录他们在辛亥年的生活轨迹和若干典型画面，以反映时代风云，社会万象。从中可以看到张謇的“幡然改悟，共赞共和”，郑孝胥的“理不能喻，情不能感”，周氏兄弟感叹的“越中棘地不可居”、“旧梦不可道，但令心暗伤”以及他们对“辛亥革命的前景不见得佳妙”的判断，胡适的“一点点怀疑的倾向”，吴宓的“姑先一试”。全书大量引用所选人物的日记、书信、文章并参照有关资料，努力用事实说话，可供一般文史爱好者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他们在大清末年 / 顾孝华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

ISBN 978 - 7 - 313 - 07742 - 4

I. ①他… II. ①顾… III. ①历史人物—生平事迹—中国—清后期 IV. ①K82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0321 号

他们在大清末年

顾孝华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64071208 出版人：韩建民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10 mm×1000 mm 1/16 印张：19.25 字数：290 千字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13 - 07742 - 4/K 定价：3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512 - 52219025

前言

今年是辛亥革命 100 周年。杨绛先生说：“我一岁时恰逢中华民国成立。我常自豪说：‘我和中华民国同岁，我比中华民国还年长一百天！’”今天能像杨绛先生这样“自豪说”的人寥寥无几，我们这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都尚未出生的人，如果也想对辛亥革命说些什么，通常有两个思路：或是说说它的细节，或是说说它的背景。

秦晖先生对辛亥革命的细节和背景有个说法：“这些年来在辛亥前后历史细节的考证逐渐清晰的同时，这场革命的宏观背景却越来越模糊。……对辛亥的认识离不开对其前因后果的认识，否则细节再清楚，也就像一部活剧，如果剧本糊里糊涂，演员再怎么活灵活现，观众还是会一头雾水。”此话很有道理。但是在加强背景研讨的同时，把细节进一步弄清楚也总是好的。且不说细节越清楚历史就越像一部活剧，有些细节弄清楚了，有助于对背景的认识也未可知。

感谢上海市社联等单位给了我写些辛亥革命细节的机会。这里的细节被我落实到人，按照我的初衷，想选 10 个左右不同年龄、身份和立场的人，叙述他们在辛亥年的生活轨迹和若干典型画面，从中窥见时代风云，社会万象。但结果却不尽理想，至少有 4 个毛病。首先是写到的人少了一些，即使把周氏兄弟一并算入，也只有 7 个人；其次是写到的人中没有 40～50 岁的，人为地造成了一种“断层”；第三，由于只写了 7 个人（严格说是 6 个），所以他们的身份不够“多样化”；最后但决非最不要紧的是，写到的这 6、7 个人，对他们在辛亥年生活轨迹和典型画面的把握肯定有不尽准确的

地方。此外无疑还有其他毛病,还请读者批评指正。所以会出现这些毛病,有主客观两方面原因。主观原因可以借用鲁迅在辛亥年说的一句话:“力小愿宏”。客观原因是写作时间比较紧张。其中主观原因是第一位的,而“力小”又是“第一”中的第一。

这本书虽然写得不尽理想,“丑媳妇”却最终还能出来见“公婆”,足证方方面面的宽宏大量。我在感激之余惟有一个心愿:以后如有修订机会,努力把它改得好一些。

最后要感谢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市历史学会、上海中山学社和上海宋庆龄研究会组织的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学术活动,把本书列为入选著作之一。交稿之际,首先要感谢以上单位的辛勤组织、积极支持和各位专家的评审,感谢上海市社联王志娟女士的辛劳。书中引用了很多著作(详见引用书目),作者和编者的不少说法也使我受益匪浅,请他们接受我的感谢。滕振国先生为我的写作提供了宝贵意见,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郁金豹先生、吴芸茜女士和姜浩先生为本书出版出了大力,也请接受我的谢意。

顾孝华

2011年8月

目 录

第一篇 张謇	1
“戊戌出京,今已十四年”	1
“国势危急,謇所欲陈者”	16
“工程营地火作,即长亘数十丈”	27
“幡然改悟,共赞共和”	34
“甲日满退,乙日拥公”	43
“大局定矣,来日正难”	55
第二篇 郑孝胥	65
“今年踪迹颇极纵横”	65
“深心远识《觐国谈》”	76
“之官而北上”	90
“留京而南归”	100
“寝不安席,食不甘味”	110
“理不能喻,情不能感”	120
第三篇 周氏兄弟	130
“越中棘地不可居”	130
“代醇酒妇人者”	137
“旧梦不可道,但令心暗伤”	143
“比看会还热闹”	151
“没做什么工作,只是高兴得很”	160

“前景不见得佳妙”	168
第四篇 胡适	182
“遥祝吾母大人新禧百福”	182
“一点点用功的习惯”	191
“一点点怀疑的倾向”	206
“我几乎做了基督徒”	213
“回首故国,此何时乎”	218
“勉力学农,是否已铸成大错”	226
第五篇 吴宓	235
“风光客里漫相过”	235
“姑先一试”	242
“宓殊以为荣”	252
“春来花事新”	260
“使人几如痴如醉”	273
“清华人心惶惶”	282
引用书目	296

第一篇 张 謇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翁,江苏南通人,时年 59 岁。江苏大生纱厂和通海实业公司总理,上海预备立宪公会会长,江苏省谘议局议长,中央教育会会长等。武昌起义后任江苏省议会议长,1912 年 1 月 2 日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1 月 30 日(辛亥年十二月十二日)辞职。

“戊戌出京,今已十四年”

我国历史上第 77 个辛亥年五月十二日(1911 年 6 月 8 日)上午,张謇在若干随从陪同下,从河南彰德——他老朋友袁世凯“息影”的洹上村就在附近——乘京汉线北上,前往阔别近 13 年的北京。“13 年”是实算,如果虚算,则他“自戊戌出京,今已十四年”了。

老式蒸汽机车喷着浓烟一路向北。石家庄过了,保定过了,前面就是北京了。近乡情怯。近北京呢?至少张謇的心情是复杂的。

北京是张謇的福地。26 年前(1885 年),他在这里参加顺天乡试,不仅中举,而且名列第二。之前他 5 次参加江南乡试,均告不中,第一次参加顺天乡试就中式,北京待他可谓厚矣。更何况顺天乡试虽然在我国北方地区闻名遐迩,南方士子却很少参加;即使参加了,中举的也不多,考到第二名即所谓“北榜第二”的,200 多年来连他这个“南人”在内总共只有 3 个人,北京怎能不令他

百般感激？然而他当时做梦也不会想到，9年后，北京还将给他带来更大的运气。

像今天学生当了硕士还想考博士一样，中举后张謇也想“更上一层楼”，来个“赐同进士出身”（三甲），最好当然是“赐进士出身”（二甲），至于一甲，他倒没有非分之想。于是在接下来的7年（1886～1892）中，他4次参加会试（1886、1889、1890、1892年），可惜北京于他的福分似乎已尽，每次都铩羽而归。第四次“仍不中”后，他伤心透了，以为“可以悟命矣”^①。从15岁参加科考算起，他已20余次走进考场，在考场度过的日子足足有149天，“不可谓不久，年又四十矣，父母必怜之，其不可已乎？”^②想到这里，他像抽烟的人发誓戒烟时扔掉烟具一样，把考篮、考灯等考试用具统统扔了，意态可谓决绝。

1894年（甲午年），朝廷因慈禧60大寿举行所谓恩科会试，张謇根本不想去凑这份热闹。这时他77岁的老父出来说话了：“儿试诚苦，但几年未老，我老而不耄，可更试一回。”当时他已42岁了，但在他父亲看来却还“未老”，还可以去考场发挥“余热”，可见他“父母必怜之”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我老而不耄”，言下之意是他父亲在有生之年，还希望能看到儿子有进士及第、光宗耀祖的一天。老父之命他“不敢违，然意固怯，迟迟乃行”^③。行前他没做什么准备，甚至连考试用具都是到北京后“杂借之友人”，在有清一代114个状元中，这恐怕是前所未有的。但事情就是如此诡谲，不想入闱、更不敢做“状元梦”的他，这次不仅金榜题名，还中了“一甲一名”。北京，果然是他的福地。

不过正如张爱玲（1920～1995，张佩纶的孙女）说的，“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④，张謇42岁做状元，虽然也“无限好”，毕竟晚了一些，所以在他当天日记里，没有欣喜若狂，没有感激涕零，没有豪言壮

① 《张謇全集》（第六卷），第336页，光绪十八年（1892）四月十一日日记。

② 关于张謇在考场度过的天数（截至他第四次会试失败），他有两个说法。据他光绪十八年（1892）四月十一日日记，“合戊辰（1868）以后，计凡大小试百四十九日在场屋之中矣”，见《张謇全集》（第六卷），第336页。据《啬翁自订年谱》，“计余乡试六度，会试四度，凡九十日；县州考、岁科试、优行、考到、录科等试，十余度，凡三十日；综凡四月……”，见《张謇全集》（第六卷），第851页。这里取日记说法。

③ 《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六卷），第852页。

④ 张爱玲：《〈传奇〉再版的话》，张爱玲、胡兰成：《张爱胡说》，第209页。

语,甚至不见丝毫喜气,有的只是一种美人迟暮的感慨,一种出乎意料的惊疑:“栖门海鸟,本无钟鼓之心。伏枥辕驹,久倦风尘之想。一旦予以非分,事类无端矣。”^①想到翁同龢 26 岁做状元,看到这次与他同场考试并中了二甲六十三名的熊希龄只有 25 岁,他的快乐多少被打了一些折扣。值得一说的是,42 岁时就“无钟鼓之心”且“久倦风尘之想”的张謇,19 年后又与“少年得志”的熊希龄坐到了一起,但这次名列前茅的是熊,熊出任袁世凯的国务总理,他出任农商总长^②。

北京为什么会成为张謇的福地?不妨借用他的一句话来说。1899 年 10 月,他因办的通州纱厂初见成效(见下文)去南京向当时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报喜。“相见大欢,(刘)拱手称谢。对曰:‘纱好地也,机转天也,人无与焉。’”^③“人无与焉”,当然是他自谦,事实上是“人有与焉”,没有他的努力,纱厂的起步肯定要推迟。同样,在他中举、中状元的背后,也是“人有与焉”。不过这个“人”不是他本人,也不是他的业师,而是他的座师:位高权重的潘祖荫和翁同龢,尤其是翁,在关键时刻帮了他大忙。1885 年乡试,他先被定第六,“后潘、翁两尚书以二三场争之,乃定第二”^④。1894 年会试,他先被定第十一,“常熟师(翁同龢)改第十”^⑤,从而得到了宝贵的参加殿试的资格。殿试后,翁同龢把他的卷子定为第一,并在呈递光绪时不失时机地说了一句“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说得标榜“以孝治国”的“上大喜”^⑥,于是名次就这样定下来了。如果没有翁出手,他也能中举,也能获得赐同进士或进士出身,甚至成为探花、榜眼,但乡试不可能是“南元”(南人在顺天乡试中名次最高者),殿试不可能是状元。

① 《张謇全集》(第六卷),第 362 页,光绪二十年(1894)四月二十四日日记。

② 这次名列前茅的本来也是张謇。据张謇说,1913 年 8 月,“袁选电属组阁,力辞,荐熊希龄”。见《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六卷),第 880 页。

③ 《张謇全集》(第六卷),第 426 页,光绪二十五年(1899)九月二十日日记。

④ 《张謇全集》(第六卷),第 252 页,光绪十一年(1885)九月十二日日记。

⑤ 《张謇全集》(第六卷),第 362 页,光绪二十年(1894)四月十七日日记。张謇在 1892 年会试时就受到了翁同龢等人“照顾”,据郑孝胥说,会试时“场中索季直卷,误以葆真当之,遂中会元。季直殊不平……”《郑孝胥日记》(第一册),第 295 页,1892 年 5 月 21 日日记。当时级别最高的考场黑幕,由此可见一斑。相比之下,鲁迅祖父的事情“层次”太低了。

⑥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 2694 页。光绪二十年(1894)四月二十四日日记。翁同龢所以对张謇施以援手,固然有爱惜人才、提携同乡的意思,但更重要的是出于为本“圈子”招徕成员、储备干部的考虑。

北京当时是张謇的福地,后来却成了他避之唯恐不及的是非之地。就在他春风得意中状元后不久,国家却倒了大霉,在与“倭人”海战、陆战中一败涂地。他当时是翰林院修撰(按明清科举制度,中状元即授),不仅频频给翁同龢出谋献策(在不到3个月里给翁写了20余封密信,有些主意误导了翁)^①,还与翰林院30多个修撰一起上“请罪北洋(李鸿章)公折”,并“单衔上推原祸始,防患将来,请去北洋折”^②,很是慷慨激昂了一番。即使听说“父背病疽,愈而未复”,他虽然“心滋不宁”,还是觉得“国事方亟,不可言去”^③。然而不幸,正当他在京城政治舞台上初露锋芒之际,他父亲去世了,他“不言去”也只能“去”了。“去”时他不知道,李鸿章记住了这笔账,以后给慈禧开了一份多达57人的“黑名单”,“请禁勿用”,而他在这57人中,“名殊不后”^④。

1898年5月,已过了守制期的张謇到北京向翰林院销假并补“散馆试”^⑤。其时正值百日维新前夕,各派政治力量正在京城展开激烈的斗争。他自然像在甲午年时一样,坚决站在翁同龢一边。从他抵京到翁被“开缺回籍”这50多天中,他们多次密谈,甚至谈到“虞山(翁同龢)谈至苦”、“无所不谈”(翁同龢语)的程度^⑥,可见他们师生关系非同一般。至于翁“苦”什么,他们又是如何“无所不谈”的,没有第三者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谈话内容涉及朝政,详情则“不足为外人道也”。除了给翁出主意之外,他还为翁代拟了《大学堂办法》,算是为维新运动做出了一份贡献。不消说,翁对他相当赏识,认为他是“霸才”、“奇材”^⑦。如果翁不下台,他的仕途前景肯定看好。

① 张謇致翁同龢密信,见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第六册),第445~461页。参阅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第356、357页。

② 《张謇全集》(第六卷),第367页,光绪二十年(1894)九月四日日记。

③ 《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六卷),第853页。

④ 《张謇全集》(第六卷),第381页,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月八日日记。

⑤ 散馆试是清代对翰林院庶吉士的一种甄别考试。清制,进士经殿试后,除一甲三名授翰林院修撰、编修外,其余均为庶吉士。庶吉士在翰林院学习三年后参加考试,考后按成绩分配,或在京任各部主事,或到地方任知县等。张謇所以也参加散馆试,可能与他授修撰后不久即丁忧回籍有关。

⑥ 《张謇全集》(第六卷),第410页,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五日日记。《翁同龢日记》(第六册),第3133页,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五日日记。

⑦ 《翁同龢日记》(第六册),第3131、3132页,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十八日、二十日日记。

然而风云突变,6月15日,翁同龢突然被“开缺回籍”。张謇当天就获知这个“恶讯”,“所系甚重,忧心京京”,感到“朝局自是将大变,外患亦将日亟矣”^①。次日,“城南士大夫人心皇皇”^②(当时北京城南一带聚集了众多地方会馆,是士大夫集中之地),他想来也是“中心皇皇”,翁的遭遇无疑使他实实在在地感受到“高处不胜寒”。两天后他去探望翁同龢,劝恩师“速行”,他自己也准备“速行”。7月20日,他“赴翰林院听宣”后立即辞去了刚刚奏派的“大学堂教习”一职,理由很充分:“通州纱厂系奏办经手未完”,第二天就离开了北京。

张謇离开北京时无人相送。当天他在日记里写道:“读书卅年(十六岁入学为附学生员),在官半日,身世如此,可笑人也。”^③其实“合甲午计”即算上中状元后任翰林院修撰这段经历,他“前后做官一百二十日”^④,还不及他在考场度过的日子。“可笑”与否姑且不论,这笔账不知情的肯定看不懂: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哪有有官不做去办厂的道理?但他自己很清楚,现在的北京已不是让他中举、中状元的北京,再待下去不可能给他带来任何好运。两个多月后,北京果然“有言拿问张季直者”^⑤。再过两个月,翁同龢不仅被革职、永不叙用,而且被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其实张謇即使在北京也未必会被“拿问”——他毕竟不是什么“帝党决策人”^⑥,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因为与李鸿章的这笔账以及与翁同龢的关系,宦途算是完了。

戊戌年离开北京后,张謇在接下来的13年中忙得不亦乐乎,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虽不做官,未尝一日不做事”^⑦,用老朋友郑孝胥的话来说叫“比做官

① 《张謇全集》(第六卷),第410页,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七日日记。

② 《张謇全集》(第六卷),第410页,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八日日记。

③ 《张謇全集》(第六卷),第412页,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三日日记。这个“官”指“大学堂教习”。

④ 《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六卷),第858页。

⑤ 《郑孝胥日记》(第二册),第687页,1898年10月6日日记。

⑥ 有论者说,“甲午战争爆发以后,慈禧为了缓和舆论的愤激,在主战、主和两派之间寻求平衡,先后起用翁同龢、李鸿藻等人值军机,而翁在孙毓汶病免后便位居汉人军机大臣之首,这就更加显示出张謇作为帝党决策人的重要性”。(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第36页)这个说法似可讨论。张謇虽然与翁同龢关系密切,但无论从哪方面说都称不上“帝党决策人”:一个新科状元,也不担任什么重要官职,怎么可能成为“帝党决策人”?

⑦ 《张謇全集》(第六卷),第651页,宣统三年(1911)六月十七日日记。

更忙”^①。甚至忙到一年只在他南通老家待一个多月的程度(庚戌年只在家里待了42天,丙午年更是只在家里待了39天),比通常做官的忙多了。张謇既然“不做官”,为何这般忙碌?举其荦荦大端而言有三,曰实业,曰教育,曰立宪。

先说实业。《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出于自强考虑,决定在苏州、通州(南通)各办一家纱厂,并想让张謇来经办后者。张之洞所以会看中张謇,原因是他在1895年春因“海氛告警”让通州等地办团练时,张謇这个丁忧在籍的前修撰给他留下了“学识素优,博通经济,实心任事,允恰乡评”的印象^②,不久又觉得张謇还“讲求时务,情形较熟”,于是就“属其邀集绅商,剴切劝导,厚集股本,就地设立纱丝厂,以副朝廷自保利权之至计”^③。这是1895年末至1896年初的事,据张謇回忆,当时

余自审寒士,初未敢应,既念书生为世轻久矣,病在空言,在负气,故世轻书生,书生亦轻世。今求国之强,当先教育,先养成能办适当教育之人才。而秉政者既闇蔽不足与谋,拥资者又乖隔不能与合。然固不能与政府隔,不能不与拥资者谋,纳约自牖,责在我辈,屈己下人之谓何,踌躇累日,应焉。^④

这段话虽然是张謇晚年写的,但多少反映了他当年决定“屈己下人”去办厂的思想过程——时尚叫“心路历程”,值得细细研读。

“寒士”指他出生于一个亦农亦商家庭,农者,无非是薄有田产;商者,贩卖碗盏之类家用瓷器而已。这种家庭虽然也“颇温饱”,但与翁同龢比,与他斥为“谬妄已甚”的谭嗣同比,实在是“寒”得很。现在好不容易中了状元,做官才为正途,怎么可以去办厂?所以他“初未敢应”。

“书生为世轻久矣”,就以与清末几次战争有关的来说,鸦片战争时琦善讥

① 《郑孝胥日记》(第三册),第1267页,1910年7月30日日记。

② 《留张謇沈云沛办通海等属团练片》(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四日),《张之洞全集》(第二册),第972页。

③ 《通海设立纱丝厂请免税厘片》(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张之洞全集》(第二册),第1117页。

④ 《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六卷),第855页。

讽前线“任军事者，率皆文臣，笔下虽佳，武备未谙”^①，中法战争时张佩纶临阵逃脱更是一大丑闻，到中日战争时连“倭人”也看出问题了：“取士必以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显荣之阶梯耳，岂足济夫实效？”^②至于书生“轻世”，这本身就是一种“空言”、一种“负气”。张謇能想到“世轻书生，书生亦轻世”这个“怪圈”，说明他不仅不愿做“轻世”的“书生”，而且想通过自己努力，改变“世轻书生”现象。

“求国之强”是张謇这一代士大夫的共同心声，中日战争后这种心声更为强烈。以张謇来说，在看到《马关条约》那天，他在日记里痛心地写道：“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③不过对“求国之强”应从哪里入手，士大夫们有不同主张，不少人的认识还有一个发展过程。以张謇来说，有论者认为他晚年这段回忆“对当时接收委托时内心活动有十分真实的描述”^④，其实在张之洞让他去办厂时，他还没有认识到“求国之强，当先教育”，更不要说“先养成能办适当教育之人才”了。在他1895年6、7月为张之洞拟写的一篇《立国自强疏》中，他提了8条对策，前三条依次是“宜练陆军”、“宜亟治海军”和“宜分设枪炮厂”，第四条才是“宜广开学堂”^⑤。一直到1901年甚至1903年，他才开始认识到“求国之强，当先教育”（见下文）。换言之，在他考虑是否去办厂时，他想到的是“求国之强，当先实业”，而不是“当先教育”。

办实业既要与当政者“谋”，也要与拥资者“合”，因为前者有权，后者有钱。张謇当然知道当官的愚昧不明，有钱人不讲情理，所以从内心来说，他并不愿意与他们“谋”和“合”。但为了“求国之强”，他不仅不能与当官的“隔”，也不能不与有钱人“谋”。这样对他来说自然是“屈己下人”，与有钱人“谋”更是如此，因为在“士农工商”这“四民”中，“商”排名最后，“士”排名第一，而他这个状元还是“第一”中的第一。但“纳约自牖”（出自《易经》，意思是导人于善）本来就是士大夫的责任，既然如此，“屈己下人”又算得上什么？“踌躇累日”后他终于

①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30页。

② 《伊东佑亨致丁汝昌书》，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第172页。

③ 《张謇全集》（第六卷），第371页，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六日日记。

④ 卫春回：《张謇评传》，第44页。

⑤ 《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1895年），《张謇全集》（第一卷），第35页。

“应焉”。

以上是张謇自己说的当年答应张之洞去办厂的经过。其实他当年所以会“应焉”，还有一个重要原因。1905年，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乙未、丙申纺厂之设，正已人事乖舛，遂被牵率，非始愿所敢肩任”^①。“乙未、丙申”即1895、1896年。“人事乖舛，遂被牵率”，或指他因在1894年上书“请去北洋”而上了“黑名单”一事，或指他与翁同龢的关系，或两者兼有。现在既然因“政治问题”而失去了在官场飞黄腾达的可能，办厂也就成了他不多的选择之一。至于“始愿”是什么，他在信里没有说，不过恐怕不是办厂。是做官吗？他当时没有说，以后说过“謇生平不乐政界”、“自前清即矢志为民”^②，但事实是他在武昌起义后不仅进入政界，而且做了大官。

“应焉”之后，张謇在张之洞、刘坤一等大员支持下，以官商合资并由他总管一切的形式，着手创办通州纱厂（取名大生纱厂）。1898年7月从北京回来后更是全力以赴，经过几年努力，克服了“集资难”、“求才难”和“御侮难”^③，纱厂终于在1899年5月开车纺纱成功。不久“厂纱日佳，价亦日长”^④，张謇掘到了办实业的“第一桶金”。接着为解决纱厂原料问题，他又集资办了占地数万亩的通海垦牧公司。然后一发不可收拾，先后办了油厂、面厂、皂厂、铁厂、桑蚕公司、盐业公司、酿造公司、内河小轮公司等19家企业（1907年，他把这些企业组合成通海实业公司），并投资电灯厂、玻璃厂、铁路公司和银行。到辛亥年，张謇办的实业已形成一个以大生纱厂为核心的企业集团，盈利丰厚，仅大生纱厂就“纯利累积共达三百七十余万两，资本总额也增加到将近两百万两”^⑤。

张謇做实业成功了，成了一个大资本家，“状元办厂”成了不少论者津津乐

① 《辞谢农工商大臣见召答友函》（1905年），《张謇全集》（第一卷），第92页。

② 《致袁世凯函》（1912年2月22日），《张謇全集》（第一卷），第212页。

③ 《辞谢农工商大臣见召答友函》（1905年），《张謇全集》（第一卷），第92页。

④ 《张謇全集》（第六卷），第421页，光绪二十五年（1899）六月二十四日日记。

⑤ 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第139页。有论者说到1910年，大生企业集团资本规模达到338.7万两，见虞和平主编：《张謇——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驱》，第155页。据张謇自己说，宣统元年（1909）大生正厂“半年余利银十五万两”，分厂“半年余利四万两余”，《张謇全集》（第六卷），第624页，宣统元年（1909）八月六、七日日记。

道的故事。但正如蒋廷黻说的,“中国旧日的资本家有几个不是做官起家?中国旧日的大商业哪一种没有官吏作后盾,仗官势发财?”^①质之张謇,也是如此。张謇虽然在做实业前只“做官一百二十日”,毕竟也做过官,更何况他做的是翰林院修撰。修撰职级不高,只是从六品,但据他自己说,授官那天“皇上御太和殿传胪,百官雍雍,礼乐毕备”,“伏考国家授官之礼,无逾于一甲三人者”^②,可见这个官虽然没有实权,皇上、“百官”还是很拿它当一回事的。至于“大学堂教习”一职,尽管“在官半日”就被他辞去了,但他的状元和前修撰身份是辞不去的,而在奉行科举制度的朝代,这种身份本身就是一种进出官场的资格,没有这种身份,一个乡下“寒士”怎么可能结交张之洞、刘坤一、端方(曾任两江总督)、瑞澂(曾任江苏巡抚)等大员,更不可能得到因为这种结交而带来的种种好处。以张謇来说,他在为大生纱厂制订的《厂约》中规定了“下走”即他自己的职责,其中第一条是“通官商之情”(他晚年说自己是“通官商之郎”)^③。从他办厂来看,他很好地履行了这项职责。问题是,他如果与督抚大员没有交情,凭什么去“通官商之情”?又怎能做“通官商之郎”?举两个例子。其一,张謇在办垦牧公司时以极低的价格购置了通州沿海地区数万亩荒地,如果没有官场关系,怎么可能拣到这些便宜?其二,他出于所办实业的警卫之需,先后购买了“枪九十二支,(火)药一千二百磅”和“滑膛枪二百支”^④,有清一代严格管制枪药,没有大员点头,怎么可能购买这些“禁物”?

此外还应指出,在张謇做实业成功后,朝廷让他做官,他欣然接受。1904年4月20日,他接到一道上谕:“张謇著赏加三品衔作为(商部)头等顾问官,钦此。”他在当天日记里写道:“江海之臣,宦情久绝,忽被恩命,甚愧叨逾。……王命之孚为可感矣。”感激之余,这次他没有辞却,理由是“官为新制,又系实业于经营实业界中,或者小有裨益”^⑤。其实岂止是“小有裨益”,这次做官,更进一步

①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61页。

② 《张謇全集》(第六卷),第362页,光绪二十年(1894)四月二十五日日记。

③ 《厂约》,《张謇全集》(第三卷),第18页。《啬翁自编年谱》,《张謇全集》(第六卷),第855页。

④ 《张謇全集》(第六卷),第464页,光绪二十八年(1902)二月二日日记。

⑤ 《张謇全集》(第六卷),第527页,光绪三十年(1904)三月五日日记。按:1906年“商部”改“农工商部”。

提高了他的身价,加强了他与官场的关系,而这种身价和关系,正是他把实业做大、做强的奥妙所在。

当然,张謇做官与郑孝胥以及他另外一个老朋友汤寿潜做官是有区别的。郑做的布政使、汤做的知县都是实缺,而张謇被赏赐的官是虚衔,用他的话来说是一种“宾师之位”。“宾师”者,“旧时指不居官职而为君主所尊重的人”(《辞海》),“宾师之位”就是君主授予这些人的荣誉性官职。这些官职与布政使、知县等虽然有种种区别,但做官的本质是一致的:它们都是“钦命”的,都是君主对自己看得上眼的人的一种赏赐。被“钦命”者或者成了衙门的老爷,或者得到了进出衙门的“通行证”。张謇属于后者,没有这种“宾师之位”或“前翰林院修撰”这个头衔,他怎么可能随意进出森严的两江总督府?

总之,张謇说自己“不做官”,这个“官”仅仅指实缺官,而他的实际地位远非一般的官所能比拟。正是这种地位,为他创办实业奠定了基础,也为他随后办教育、搞立宪铺平了道路。

再说教育。前面已经指出,早在《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张謇就把“广开学堂”作为“立国自强”一项对策。1901年,他对办教育与“求国之强”的关系有了进一步认识。该年3月,他响应朝廷办“新政”号召,写了一篇长达2万余字的《变法平议》。在这篇《平议》中,他按“六部”(吏户礼兵刑工)顺序,提出了变法应办的42件事,其中礼部应办8件事,第一件就是“普兴学校”。在这42件事中他又按“施行之次第”排了3个序列,其中“第一”要办的有4件事,而“(在)各府州县城设中学堂”仅次于“请设议政院”^①。同年4月,他在谒见刘坤一时把办教育提到了与理财并行的高度,认为“变法须财与人,财不胜用也,行预算订税目而已。人不胜用也,设学堂行课吏而已”^②。这一年春他还“上书新宁督部(刘坤一),请先立师范学校”,因为“一艺之末,学必有师,无古今中外之通义也;况图国家强立之基、肇国民普及之教育乎?”^③

张謇提出的“普兴学校”并“先立师范学校”的设想得到了刘坤一赞同,但

① 《变法平议》(1901年),《张謇全集》(第一卷),第61、75页。

② 《张謇全集》(第六卷),第450页,光绪二十七年(1901)二月二十三日日记。

③ 《通州师范学校议》(1902年),《张謇全集》(第四卷),第11页。